



黄土与红旗：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 传统文化研究

Loess and the Red Banner:
Study on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During Yanan Period

黄延敏 著

学习出版社



黄土与红旗：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 传统文化研究

Loess and the Red Banner:
Study on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During Yanan Period

黄延敏 著

宇习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黄土与红旗: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传统文化研究 /

黄延敏著. — 北京: 学习出版社, 2014. 11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ISBN 978 - 7 - 5147 - 0488 - 4

I. ①黄… II. ①黄… III. ①中国共产党 - 文化思想 -
研究 - 1935 ~ 1948 IV. ①G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55416 号

黄土与红旗: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传统文化研究

HUANGTU YU HONGQI: YAN'AN SHIQI ZHONGGUOGONGCHANDANG
YU CHUANTONG WENHUA YANJIU

黄延敏 著

责任编辑: 李 岩

技术编辑: 贾 茹

封面设计: 杨 洪

出版发行: 学习出版社

北京市崇文门外大街 11 号新成文化大厦 B 座 11 层 (100062)

010 - 66063020 010 - 66061634 010 - 66061646

网 址: <http://www.xuexiph.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密东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6.75

字 数: 283 千字

版次印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47 - 0488 - 4

定 价: 34.00 元

如有印装错误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主要类别之一，旨在鼓励广大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潜心治学，扎实研究，多出优秀成果，进一步发挥国家社科基金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中的示范引导作用。后期资助项目主要资助已基本完成且尚未出版的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研究的优秀学术成果，以资助学术专著为主，也资助少量学术价值较高的资料汇编和学术含量较高的工具书。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学术影响，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2014年7月

序

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7月诞生，在经过短暂的建党时期之后，经过国共合作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共合作的抗日战争时期，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到1949年10月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间仅仅经历28年。如此短暂的历时，中国共产党就栉风沐雨，冒冰刀、顶霜剑、抛头颅、洒热血，就从小到大，以弱胜强，让中国天翻地覆，沧海桑田，这绝对是惊天地泣鬼神令人间为之感叹的伟大历史奇迹！

如深究其历史原因，当然多不胜数，甚至众说纷纭。不过，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对此问题的亲身体会性总结最为可靠可信——

1939年10月，毛泽东在所写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总结了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揭示了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指出：“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

在毛泽东思想史和中国共产党思想文化史上，正因为这一篇《〈共产党人〉发刊词》提出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这“三大法宝”理论，与《新民主主义论》及《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论著一起，被作为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思想成熟的理论标志”来看待，确有道理。

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写出了《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雄文，指出“孙中山的四十年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二十八年，就大不相同。我们有许多宝贵的经验。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这些都是我们区别于前人的。依靠这三件，使我们取得了基本的胜利。我们走过了曲折的道路。我们曾和党内的机会主义倾向作斗争，右的和‘左’

的。凡在这三件事上犯了严重错误的时候，革命就受挫折。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了，我们的事情就办得好一些。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要求犯得少一点。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

如果结合中共党史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历史背景，仔细品读审视毛泽东这两篇文章，我们不得不由衷地钦佩毛泽东思想的高明光辉：“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这“三大法宝”，确实是中国共产党胜利的三大根本“绝招”。对此，毛泽东真正彻底看明白也彻底说到家了！

在毛泽东所论这“三大法宝”之中，姑且不论“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两条，仅就“党的建设”这一条而言，从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的角度来看，也是非常值得深入研究的。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近代清末民初以来西学东渐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这4位都是西方人，他们从来没有亲身到过中国，对中国也没有特别全面深入系统的研究，为什么他们的“主义”就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呢？这固然是因为他们的理论特别适应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需要，但最重要的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和精英们在长期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思想、观点和方法，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结合，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转化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路线，并逐渐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因此，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的1945年4月23日到6月11日，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会场中央高悬着这样的标语——“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经过解放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毛泽东卓然成为开国领袖，那是势所必至而理由固然的。

当1935年10月中共中央领导工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的时候，中国共产党被国民党军队追杀得是何等的衣衫褴褛和疲惫不堪！然而，到1948年5月中共中央到达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那个小乡村的时候，中国共产党面对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又是何等的兵强马壮和气势如虹！中国共产党正是陕北黄土高坡延安这关键的13年，经过在中华民族抗日战争中砥柱中流，如有神助和变戏法似的实现了由小到大和由弱到强的伟大历史转折。正因为这13年间中共中央稳定在陕北延安，中共党史学术界称之为“延安时期”。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形成了。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的第一个伟大里程碑，也是外来思想文化体系中国化历史上继古代印度佛教中国化之后的第二个伟大里程碑。如果说中国古代对外文化交流史上“向西天取经”，结果是“佛教中国化”，那么中国近代对外文化交流史上“向西天取经”，结果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是世界文明史上最庞大、最精密、最坚韧的唯心主义思想文化体系。在中国古代对外文化交流史上，佛教于东汉初年经西域传入中土之后，是历代中国高僧大德不辞艰辛地“向西天拜佛求经”求来的。这一株从印度次大陆移植过来的菩提之花来到中土之后，经过东汉魏晋南北朝的藤萝蔓延以及与中国土生土长的儒道思想文化的不断冲合，隋唐时期佛教与中国土生土长的儒道思想文化既互争高下又并行不悖地发展，逐渐在中土落地生根并开花结果，形成了中国化的佛教思想文化体系。在中国佛教史上的“三论宗”（又名“法性宗”或“般若宗”）、“法相宗”（又名“瑜伽宗”、“慈恩宗”或“唯识宗”）、“天台宗”（又名“法华宗”）、“华严宗”（又名“贤首宗”）、“禅宗”（又名“佛心宗”）、“净土宗”（又名“莲宗”）、“律宗”（又名“南山宗”）和“密宗”（又名“真言宗”）等“汉传大乘佛教八大宗派”之中，其中的“禅宗”就是典型的中国道家“老庄化”的佛教。特别是到宋代，由于真宗皇帝赵恒写出了《崇儒论》、《崇释论》、《崇道论》，佛教终于化解了来自于儒家阵营就“忠”和“孝”两大责难，儒释道三教从此之后融合多于斗争，并逐渐趋于合流，甚至扭结交合成三位一体，变得你中有我而我中有你，宋元之际形成的新道教宗派“全真道”就是三教合一的典型。宋元明清时期，在思想文化界占主流地位的程朱理学，就含有丰富的佛教思想文化因子。宋代之后佛教系统内部其他宗派式微而出现“禅净合流”趋势，也是中国庙堂哲学儒家思想大一统影响的结果。如此一来，印度佛教真正彻底变成了中国佛教，以至于佛教完全化成了中国思想文化话语体系的主干基因之一，甚至于佛教在原产地印度当伊斯兰教军事和文化势力侵入将其毁灭殆尽之后，中国反而变成了世界佛教文化中心，迄今仍在为全世界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慈悲服务。

马克思主义，本来是19世纪中期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西方欧洲创立的无产阶级思想体系。当19世纪中期之后的中国遭遇欧美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之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曾经向遥远东方的苦难中国发出过诸多精彩评论。但是，尽管鸦片战争之后先进的中国人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

夷”，也开始不断“向西天取经”，并经过诸多欧美来华基督教传教士的介绍和中国西学启蒙思想家的努力，从“开眼看世界”到“走向世界”，从“船坚炮利”到“工商科技”，从“君主立宪”到“民主共和”，从“政治制度”到“思想文化”，以至于整个清末民初时代的中国欧风美雨浸润，西学东渐炽烈蔓延，各种西学新思潮在中国恣肆传播，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评论中国的声音并没有被太多的先进中国人所听闻。

正如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指出的那样——“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尽管各种源自西学的新的思想文化思潮莽莽荡荡而漫卷世尘，救国方案也形形色色而林林总总，令人眼花缭乱，然而经过大浪淘沙，最终先进的中国人选择了“走俄国人的路”，在并非为所谓民主政治议会斗争需要的特殊历史背景下，于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创立了一个志在根本解决中国所有社会问题的中国共产党。但是，因为中俄两国的基本国情毕竟不同，特别是通过大革命失败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右倾和“左”倾思想路线反复造成革命斗争力量挫败的艰难残酷的教训，中国共产党逐渐认识到，要想真正根本解决中国社会革命的根本问题，绝对不能照本宣科地生硬照搬外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于是开始思考探索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具体国情和具体革命斗争实践相结合的道路，直至发展到延安时期，经过划时代的党内整风运动，中国共产党才终于统一思想，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然后，中国共产党以此为指导思想，统帅以工农为主体的革命大军，从延安时期之前的“屡败屡战”和“愈挫愈奋”到延安时期之后“奋勇前进”和“从胜利走向胜利”，直至迅猛夺取全国政权而建立了新中国。

在古代佛教中国化过程中，尽管也难免有“教法与王法”以及“神权与政权”之争，但中国历代汉地中央政权始终没有出现完全意义上的政教合一王朝。在近代西学东渐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中，尽管以此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艰难征程中也有过抑扬顿挫和一吟三叹，但最终将这种思想文化创造性地转化成了能动的社会革命力量，指导全国人民打出了一个由中国共产党稳固执政的新中国。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的智慧中国人，在古代“向西天取经”

和在近代“向西天取经”，都划时代地推动了中国思想文化的大发展，但两者的历史归宿却是迥然不同的。

“延安时期”之于中国共产党，特别是之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在是太重要了。就此，中共党史学术界已经出现了诸多相关学术论著，甚至在高校学科设置上还出现了与中共党史专业并列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业，这是毋庸置疑的。研究中共党史特别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中共党史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尽管要从建党初期甚至从五四时期开始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做系统的纵向历时性考察和从各个层面做横向共时性探究，但对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国情和具体革命斗争实践相结合并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应该加强大力研究。研究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固然要研究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诸多具体层面，但加强对延安时期深植于古老中华大地的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相结合历史的研究，更是题中应有之大义。

中国是一个具有数千年文明历史的古老国度，传统文化源远流长而博大精深，任何从外国移植过来的思想文化，要想在中华大地之上生根开花结果，都必须像入乡随俗和客随主便一样实现中国本土化，才可能像春风化雨一样真正逐渐化润到中国广大民众心田里。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从印度传来的佛教为了让中国人接受，在东晋时期出现过“老子化胡”之说；从欧洲传来的基督教为了让中国人接受，在明末清初出现过“儒服传教”。在中国近代史上，从欧美传来的西学，为了便于在中国广泛传播，也曾经出现过类似于“老子化胡”的“西学中源”、“中体西用”和“托古改制”等一系列土洋结合的化合景象。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是西学东渐的一大硕果，但是要想让幅员广袤、人口众多、民族复杂、历史悠久和文化层次参差不齐的中国人民都能认识到伴随欧风美雨从外而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能救民水火而指导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胜利，谈何容易啊！然而，延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以敢教日月换新天的伟大气魄，真诚鉴纳此前或“左”而激进莽撞或右而保守退却偏于两执的政治思想路线给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带来种种血的惨痛教训，以回春之妙手把外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具体国情、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可谓真正做到了“心动”、“风动”、“幡动”的三位一体，意到形随，一呼百诺，天下响应，并因之而最终使古老的中国真正从根本上换了颜色。

关于中国共产党在处理与中国传统文化儒、道、法、墨、兵、名、农、医、阴阳、纵横和杂家以及佛教等诸家流派关系问题上的时代背景、地理条件、政治空气、人文氛围、军政需要、经济支撑、知识素养、认识态度、理解水平、处理能力、因应方式、对持过程、回报结果和后续影响等繁杂因素，都是值得详审细考的。对此重大学术专题，中共党史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两个专业的学术界，迄今并未给出全面、深入、系统的立体化集大成性的重磅学术成果。既然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最值得研究的，那么黄延敏这一部《黄土与红旗：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传统文化研究》，就值得大家一读。

黄延敏，1973年生于山东沾化，形貌中正俊朗，天赋聪敏灵慧，心地慈悲善良，性格爽朗稳健，气质平和融雅，为人忠诚正直，为学踏实勤奋，尊师而重道，好学且深思，是一个出类拔萃的读书治学和经世致用种子。1996年7月，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并获得历史学学士学位，旋即到山东滨州师范专科学校（后改名“滨州学院”）执教中共党史，2001年在在职考入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从我攻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学位。因为我的研究重点一直相对集中在“传统文化与近代中国”这个学术领域，当他协助我为参加“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中共党史研究新进展学术研讨会”完成《近三十年来的中共文化史研究新进展》一文之后，我见其历史学本科根基扎实，又执教过中共党史的高校课程，对“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传统文化”领域产生了浓厚兴趣，所以在其硕士学位论文选题时，就同意他选做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传统文化研究》。经过近两年的刻苦努力，他拿出了一篇在答辩时获得全体答辩委员一致高度评价的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对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妥善处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经验做出了全面、深入和系统的学术解读。2004年7月，他硕士毕业之后，为了登高望远，又考取了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王顺生教授门下博士研究生，博士学位论文《“破四旧”运动研究》，对中国共产党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破四旧”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处理不当造成的历史教训做出了原创性学术考量。2007年7月，他博士毕业后，到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任教，并在首都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梁景和教授门下做博士后，从事中国共产党与传统文化关系研究的继续深造。通过审读其硕士论文、博士论文、博士后出站报告及其发表的其他学术论著可知，他在中国共产党与传统文化关系领域已经具有相当高深的学术造诣，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与传统文化关系的经验和教训正反两个方面已获得了令学术界都高度关注的

学术成果。

黄延敏这部学术专著叫《黄土与红旗：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传统文化研究》，名正言顺。中国传统文化色尚黄，中国共产党色尚红。“黄土”，象征中国共产党是炎黄子孙，根植于中国黄土地，与源远流长而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黄河文化有最深厚最亲密的历史关系，延安时期那一座作为中共中央象征的宝塔，就处于世界上黄土覆盖面积最大的黄土高原之上；“红旗”，代表国民党白色统治下陕北延安这个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色特区，更代表从延安时期实现了伟大崛起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红色中国共产党。

这部《黄土与红旗：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传统文化研究》，是黄延敏在其硕士学位论文基础之上，又历经10年的不懈研究、修改和完善，最终成为201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的结题成果。同时，这也是他主持的北京市“科研基地建设—科研创新平台—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文化建设创新研究平台”的最新科研成果之一。由此算来，这部著作应该是其十多年来从事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阶段性总结。

作者从学术史角度，在广泛阅读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法、墨、兵、名、农、医、阴阳、纵横和杂家元典文献的基础之上，仔细搜检了延安时期的《中国文化》、《解放日报》、《新中华报》、《解放》、《八路军军政杂志》、《群众》等大量原始报刊资料，认真爬梳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各种重要历史文献，特别是对陈伯达在延安时期古代哲学思想研究的资料以及郭化若对古代军事思想研究的资料进行了开创性搜求和整理。本书在导论之下共分九章，以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研究、批判继承和弘扬利用为切入点，通过系统考察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所进行的传统文化研究、批判、利用等文化活动，全面探究了传统文化研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传统文化研究与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关系、传统文化研究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传统文化研究与抗日战争的关系、传统文化研究与民众动员的关系等，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处理与传统文化关系的经验教训，最终推导出了三大学术结论：第一，树立科学的传统文化观，正确对待传统文化；第二，应该科学研究传统文化，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三，应该继承弘扬传统文化，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如此学术结论，实事求是、水到渠成，令人信服，恰与中共党史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符契，正与近代迄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吻合，这不啻为中国共产党在当前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新时代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理论体系做出

了扎实可靠的历史注脚。

这一部《黄土与红旗：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传统文化研究》，乃黄延敏学术事业之春云初展，因为该选题既涉及源远流长而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又涉及史料浩繁而问题复杂的中共党史，在学养、学识、学力等方面，作者难免带有青涩稚嫩之色。如关于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佛教和道教的研究、关于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抗战时期国民党统治区打着“本位文化”旗号而宣扬封建复古主义和专制独裁主义的理论批判，关于对日伪沦陷区汉奸集团利用封建主义的研究和批判等，在探析论述上尚存在着某种程度缺漏和薄弱。对某些历史材料的取舍剪裁和分析评述，也有某些不尽精准之处。但瑕不掩瑜，并不影响我向学术界和理论界隆重推荐这一部中共党史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业研究的原创性学术作品。

通览《黄土与红旗：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传统文化研究》全书，可圈可点之处斑斑可见——选题新颖恰适，场面宏阔生动，史料翔实可靠，论据充分条理，观点鲜明稳妥，学理圆转丰润，框架舒展得体，逻辑周延紧凑，论证得力到位，体例规范科学，学风朴实端正，文字平顺通达，结论正确科学，属于原创性科研成果，填补了中共党史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业研究的重要学术空白，加强了传统文化与近现代中国社会转型史以及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学术研究薄弱环节，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诗》云：“周邦虽旧，其命维新。”目前中国共产党作为当代中国执政党，正处于领导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壮丽新时代。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如何正确处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不可避免的重大的思想理论问题和社会现实问题。面对古今中外的人类文明成就，坚持“以史为鉴”，“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和“推陈出新”的思想原则，就显得更加重要。因为延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最富有活力，因为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在处理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上做得最妥帖稳健，其历史经验的思想营养价值最为丰富，所以《黄土与红旗：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传统文化研究》一书，对中国共产党科学认识文化时代性与民族性的理论关系，妥善处理外来西方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的融通关系，通过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优秀思想基因，推动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进一步创造性地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促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化体系建设，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创造力，为中华民族缔造共建、共有、共享的精神文化家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不可轻忽的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观照性。

如果结合近现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来审读《黄土与红旗：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传统文化研究》一书，我最大的感念是：中国共产党作为当代中国执政党，只有深入研判国情、高度重视国民、全面熟悉国文、谨慎资鉴国史、理性弘扬国学、尽心保养国命、巧妙造化国势、高明把握国运、科学谋划国是、全面整合国力、严肃制订国法、稳健治理国事、扎实建设国色、潜精陶铸国魂，坚持走中国道路、依靠中国力量、弘扬中国精神，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祈盼天下读者与我同心！

是为序。

田海林

2014年9月19日

泉城千佛山下

目 录

导 论	(1)
一、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传统文化的历史因由	(3)
(一) 新文化运动前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与中国	
传统文化	(3)
(二) 早期中国共产党与传统文化	(6)
(三) 对延安时期以前中国共产党与传统文化	
关系的历史检讨	(11)
二、延安时期、传统文化：本书若干概念的界定	(13)
三、为何研究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传统文化：	
本书的价值和意义	(14)
(一) 学术价值	(14)
(二) 理论与现实意义	(14)
四、学术史综述	(14)
(一) 宏观研究	(15)
(二) 专题研究	(17)
(三) 不足与前瞻	(22)
五、本书的创新点	(24)
(一) 材料上	(24)
(二) 内容上	(24)
(三) 研究视角上	(24)

第一章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重视传统文化的原因	(25)
一、中国共产党自身发展的需要	(25)
(一) 反对教条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25)
(二) 借鉴传统文化,补益革命运动	(29)
二、建设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前提	(31)
三、与国民党进行思想文化斗争及扩大马克思主义影响的要求	(34)
(一) 与国民党进行思想文化斗争的需要	(35)
(二) 反对唯心主义哲学史观,扩大马克思主义阵地的要求	(36)
四、抗日战争的民族文化呼唤	(37)
(一) 凝聚民族精神,加强民族团结	(38)
(二) 回击日本侵略者的文化侵略理论,提高民族自信心	(39)
五、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文化思潮时势的影响	(41)
(一) 20世纪30年代文化论战的刺激	(42)
(二) 民族主义思潮勃兴的影响	(42)
(三) 新启蒙运动的影响	(43)
第二章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儒家思想的研究与批判	(45)
一、对原始孔学的认识和研究	(45)
(一) 对孔子及其思想的总体评价	(45)
(二) 对孔子名实观的剖析	(46)
(三) 对孔子知行观的评判	(47)
二、对儒家经学的研究	(48)
(一) 对经及经学本质的认识	(48)
(二) 对经学史的系统梳理	(49)
(三) 对经学的辩证考量	(51)
三、对儒家“中庸”思想的研究与改造	(53)
(一) 对“中庸”概念的新诠释	(54)

(二) 对“中庸”积极因素的发掘	(55)
(三) 对“中庸”消极因素的批判	(57)
(四) 对“中庸”思想研究的评价	(59)
四、对儒家伦理思想的批判、研究与借鉴	(60)
(一) 对孔子道德观的批判与研究	(60)
(二) 对封建伦理文化的研究	(62)
(三) 对“忠”、“孝”观念的新厘定	(63)
(四) 儒家道德与共产党人的道德修养	(64)
五、对儒家思想方法和教育方法的改造和利用	(73)
(一) 儒家思想方法	(73)
(二) 儒家教育思想	(74)

第三章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墨家、道家、宗教的

研究与批判	(77)
一、对墨家思想的研究	(77)
(一) 墨家哲学基本问题	(78)
(二) 墨家“中庸”思想	(79)
(三) 墨家伦理思想	(81)
(四) 墨家社会历史观	(82)
(五) 墨家科学思想	(84)
(六) 墨家思想局限性	(84)
(七) 对墨家思想研究的意义	(85)
二、对道家与道教思想文化的研究与批判	(86)
(一) 道家的名实观、知行观	(87)
(二) 道家的自然观	(87)
(三) 道家的社会历史观	(88)
(四) 对道教迷信的批判	(89)
三、对佛教思想文化的研究	(90)
(一) “佛教是中国文化重要的构成部分”	(90)
(二) 唐代佛教研究	(90)

(三) “宋学是儒佛道的混合物”	(91)
第四章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古代兵学文化的研究	(92)
一、对战例、战史的发掘和研究	(92)
(一) 战例	(93)
(二) 郭化若对战例的研究	(94)
(三) 毛泽东对农民战争史的研究	(97)
二、对古代兵学——以《孙子兵法》为中心的研究	(99)
(一) 高度重视学习和研究《孙子兵法》	(99)
(二) 批判继承《孙子兵法》的军事思想	(101)
(三) 重点探讨《孙子兵法》的战略思想	(104)
三、从古代文史典籍中吸收军事营养	(108)
四、对古代军事思想研究的方法和意义	(110)
(一) 研究方法	(110)
(二) 研究意义	(110)
第五章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的改造与利用	(112)
一、对传统文艺的认识——以“民族形式”讨论为中心	(112)
(一) “民族形式”问题讨论的源流	(112)
(二) “民族形式”问题讨论与中国共产党对传统	
文艺资源的重视	(116)
二、“推陈出新”：对传统戏曲的改造与应用	(121)
(一) 重视利用传统戏曲进行抗战动员	(121)
(二) 平剧改革	(122)
(三) 对陕北秧歌剧的推广和利用	(125)
(四) 对传统戏曲研究的评价	(126)
三、对民族音乐的收集、整理、改造、吸收	(129)
(一) 对民歌和民间音乐的搜集、整理	(129)
(二) 民间音乐的整理、借鉴与中国新音乐	(132)
四、对民间传统美术的批判继承——以延安木刻为例	(134)